

七日談

(廣東篇)

俯瞰或者遠眺，可以發現在香港摩天大樓的鋼鐵森林之外，新界那些青磚圍屋群，一直以沉默的姿態矗立，彷彿凝固的時光膠囊。這些由花崗岩基座、青磚高牆與鑊耳碉樓構成的堡壘，不僅是嶺南民居的獨特形態，更是中原文明與海洋文化碰撞交融的活態見證。從南宋末年的流徙烽煙，到明清時期的土客紛爭，再到現代都市中的文化孤島，香港圍屋，堪稱一部用磚石書寫的「東方塢堡史」。這種獨特建築所見證的，不僅是建築技藝的演進，更是一個族群在歷史夾縫中求存的智慧與韌性。

圍屋的雛形，可追溯到東漢河洛地區的塢堡。塢堡，又稱塢壁。《資治通鑑》中註解其為：「城之小者曰塢。天下兵爭，聚眾築塢以自守。」也就是說，塢堡是一種集居住、防禦與生產於一體的莊園式建築。在那個硝煙四起的年代，中原豪族為抵禦戰亂，建造「城高池深、聚族而守」的塢堡莊園，如洛陽東部的百谷塢、女幾山下的雲中塢，等等。西晉永嘉之亂後，大批中原土族、百姓舉族南遷，由此，塢堡的建築技藝也被帶入贛閩粵山區。贛南的方圍、閩西的土樓、粵東的圍龍屋，雖形態各異，卻共享着塢堡「外牆厚逾一米、四角設炮樓」的防禦密碼。

南宋末年（十三世紀中葉），為躲避蒙古鐵騎南下，大批中原漢人舉族南遷至嶺南。其中一支，是以客家人為主的移民潮，這些中原民眾沿着東江流域進入香港新界。彼時的香港新界尚屬邊陲荒蕪之地，但因其臨海的地理屏障與山林密布的天然防線，成為中原移民的避風港之一。客家人抵港初期，沿海沃土已被廣府族群佔據，無奈之餘，只能深入錦田、粉嶺等丘陵地帶，在濱海與山谷間開闢村落。為抵禦野獸侵襲與盜匪劫掠，他們以血緣為紐帶，「聚族而居，累世同堂」，在瘴癘之地開闢出

最早的圍屋雛形——以祠堂為中心，房屋環列四周，外圍以竹籬或夯土牆圍護。

香港新界背山面海的地理格局，既提供了魚鹽之利，同時也帶來了颱風、瘴癘與海盜威脅。明朝建立後，香港沿海地區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倭寇與海盜的劫掠重鎮。洪武年間，張士誠殘部與倭寇劫掠珠江口，僅一四一四年就發生過十七次襲村事件。朝廷雖設「南頭寨」水師（今深圳南頭），但兵力薄弱，勝少敗多。為此，民間不得不設法自保。村民們大規模加築高牆、挖掘護城河，並增設鐵門與瞭望台。例如元朗吉慶圍以青磚砌築六米高牆，四角炮樓可架設炮台，牆基用花崗岩加固，形成「一村一要塞」的格局；粉嶺龍躍頭老圍更在圍牆正中建瞭望台，其東門鐵閘重達三百斤，需六人合力啟閉，形成「一圍抵千軍」的威懾力。此時的圍屋，已從家族聚居地演變為軍事要塞，牆體採用「金包銀」工藝（外層青磚、內層夯土），厚度可達一米，甚至可抵禦火器攻擊。

清初，為斷絕沿海居民與台灣鄭氏的聯繫，朝廷於一六六一年頒布《遷海令》，強制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香港一度淪為廢墟。至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復界時，原住民十不存一。夾縫中求生存的客人人藉官方招墾之機，不斷從粵東、閩西遷入。這批新移民因語言、習俗差異，與原住民廣府人爆發衝突。後來，鶴山土人馮滾率眾劫掠客家村落雲鄉，客家人以曾大屋為據點反擊，雙方死傷逾千。此類械鬥持續至一八六七年，波及新安（今深圳）、東莞、新界等地，史稱「廣東土客大械鬥」。

這場持續多年的「土客械鬥」，進一步推動圍屋防禦功能的極致化。本地圍開始加築外層青磚、內填碎石的「夾心牆」，圍牆加厚至

五米。客家圍則發展出「圍門+護城河+炮樓」三重防禦體系。其中沙田曾大屋即為此類代表：花崗石基座上築可俯瞰整個沙田海的鑊耳碉堡，牆體開射擊孔，六千平方米空間內設一百零八間房、三十六口天井，其中有十二間橫屋外牆串聯，形成三百六十度射擊視野，四角碉堡儲存火藥，地窖暗藏逃生通道。這類高強度防禦性建築，通過高密度聚居與立體防禦，形成對本地圍的制衡。至嘉慶朝，新界一百三十一個村莊中，七十一處以「圍」命名，二十一處保留角樓，儼然微型軍事堡壘群。

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新界圍村成為抗英前線。一八九九年四月，吉慶圍鄧氏族人以鐵門封鎖圍村，用土炮擊退英軍，直至圍城三十天後彈盡糧絕。英軍得勝之後，拆除鐵門運往愛爾蘭，直至一九二四年經胡適等知識分子呼籲才歸還。當時，鐵門重裝儀式吸引萬人圍觀，《華字日報》稱之為「東方騎士精神的復活」。在這一時期，圍屋從實戰堡壘逐漸轉向文化象徵，鄧氏宗祠

的盆菜宴、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等宗祠活動，成為維繫宗族凝聚力的核心。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香港「新市鎮計劃」如推土機般輾過新界，吞噬大量圍村土地。元朗吉慶圍的護城河被填平改建停車場，粉嶺龍躍頭的炮樓坍塌於地產商的打樁機下。經年改造，迫使年輕一代遠離祖屋，圍村逐漸淪為「文化空殼」。一九七六年《古物及古蹟條例》頒布後，政府啟動系統性保護工作。一九九七年回歸之後，香港圍村保護工作日益完善，現存圍村約八十四處，其中五十七處保留圍牆，二十一處存有角樓。龍躍頭文物徑串聯五圍六村，麻笏圍門樓與老圍炮樓被列為古蹟。特區政府通過「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將部分圍屋改造為文化體驗館，如曾大屋開設客家擂茶工作坊，將防禦碉樓轉化為非遺傳承空間。傳統習俗如六十年一度的上水圍太平清醮、正月十五盆菜宴仍得以延續，成為香港「活態文化遺產」的典範。

從軍事堡壘到文化符號，圍屋不僅是建築遺產，更是香港多元文明碰撞的微縮劇場，見證了華夏文明的堅韌與變通。正如學者呂思勉所言：「圍村之存，非存於磚石，而存於血脈相連之宗族精神。」圍屋，不僅訴說着過去的生存智慧，更是在提醒着我們：真正的文化傳承，不在於復刻飛檐上的石雕紋樣，而在於守護那份「既開新田以安身，又築高牆以立命」的精神基因。



◀香港粉嶺龍躍頭老圍。

樂享初夏

初夏時節，各地生機勃勃，人們走到戶外，擁抱自然，樂享美好時光。圖為近日遊客在甘肅省敦煌市鳴沙山月牙泉景區遊覽。

新華社



市井萬象



五月之約

上周末，啟德很是熱鬧。亞洲知名男團「五月天」來港開騷四場，為剛於三月正式啟用的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帶來足足十八萬入場人次，添足人氣。

黛西札記
李夢

「五月天」出道二十五年，風頭無兩。我雖不算是粉絲，對他們不同時期的代表作，卻也算是略知一二。

從一九九九年推出的第一張創作專輯，到《人生海海》中積極樂觀的生活姿態，從《後青春期的詩》中《突然好想你》和《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等代表作展現的風格日臻圓熟，到《自傳》中極富自傳意味的《任意門》以及《派對動物》的個性張揚，「五月天」的難得之處在於永遠的昂揚熱烈，永遠的肆意青春。不論對於正經歷青春苦樂或迷惘的年輕人，或是在而立及不惑之年時常回望懷想的中年人，「青春」永遠是最動人的，不是嗎？

上周五筆者在啟德主場館欣賞「五月天」本年度香港演唱會第一場。從初初步入五萬人體育場、為眼前的炫目光影和狂飆突進的結他鼓點震撼不已，到結尾處一接

首的加演曲目（encore）和主唱阿信與樂迷戀戀不捨的道別，四個多小時的演唱會是一場狂歡，更是一場邂逅，與音樂的邂逅，與嚮往和生命力的邂逅。朝九晚六返工放工、為應對瑣碎日常而疲憊不堪的你我，又有多久不曾真正地、不顧一切地肆意歡笑搖擺？早就聽說，「五月天」演唱會的絕大部分樂迷都是從開篇一直站到結尾，大聲歌唱，並隨着節奏盡興起跳。當晚在現場一見，果然所言不虛。這既是曲詞的魅力，也是聲光電影營造奇幻的魅力。就像「五月天」歌中所唱，「甩掉地球，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

不論是旋律歌詞抑或演唱會現場構建的奇幻幻境，「五月天」的音樂表達精準地戳中了許多都市青年和中年人的心事：囿於現實的寡淡無奇，卻又找不到出口與方向。之於他們，音樂不只是陪伴，更是解藥。單看現場觀眾臉上的笑和眼中的淚，看散場時人群輕盈的腳步和有人不時哼唱的悅耳旋律，便知音樂的力量，每每在言語甚至文字無可抵達的遠方。

最後，忍不住一讚場館內外工作人員的友善。入場前與散場時，工作人員的微笑問候與開心道別，讓此地生活的朋友們，也讓遠道而來的人們心頭一暖。這是五月的香港，是我們熱愛的香港。

英倫漫話
江恆

該小說以英國最長的倫敦至愛丁堡A1公路（又稱北路）為背景，這條貫穿了英國南北的主要道路，被形象地稱為「英國大動脈和脊樑」。與傳統意義上的公路文學關注個人在旅途中的成長、冒險和自我發現有所不同，作者更多地從沿途的人文歷史角度進行探究。比如，A1公路曾是古代人類活動軌跡、羅馬時期鋪設的道路和近現代通向北方的要道等等。該書如同他在二〇一五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說《共同點》中所呈現的那樣，巧妙結合遊記和自傳等風格，大量採用心理地理學的寫作方法。他把這次旅途形容為「意識修煉」，並將道路視為許多事物的隱喻：時間、英國的統一或分裂、人類生命的歷程等。就像他在書中所說，當我們注視道路時，不僅看到了我們自己，還看到道路是人類的生命線，雙方之間在身體和情感層面上建立了聯繫。儘管我們只是沿着這條路行駛，卻與這條路的靈魂進行了交流。

作者在書中提到很多生動的事例。例如A1公路在拓寬土地時的考古發現，那是

沉重的北路

一處羅馬時期的公墓，人們挖掘出了一個頭骨，「其給人一種怪異的感覺，彷彿在竭力逃避兩千年來第一次照射在它身上的光線」。由此引申出這條道路的大部分歷史都是悲愴的，就以約克郡附近的路來說，因羅馬時期當地人遭到鎮壓，又被稱為「血路」。再往南，在古北路的羅馬防線上，坐落着亨廷頓郡，那裏是斬首了英王查理一世的護國公克倫威爾的出生地，因此也是英國內戰的支點。作者在書中進一步展開聯想：克倫威爾在酒館裏向他召集來的軍隊發表演說，屋子裏面充滿了奇怪而沉重的氣氛……你幾乎可以感覺到穿着威尼斯紅色外套和子彈帶的亢奮之徒聚集在一起。然而這樣的場景，在二〇一六年公投決定脫歐時的英國似乎同樣適用，看看亨廷頓附近A1公路腹地上貧瘠的田野和枯萎的小草在灰色天空下顫抖，簡直就是英國社會困境的寫照。

這條路上還有一位爭議性人物——號稱「鐵娘子」的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她在林肯郡格蘭瑟姆A1公路旁的一間雜貨店樓上長大，並且受到家庭環境的薰陶：她那位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父親總是「斷然拒絕信任」，並且懷有「對集體社會的仇恨」。正如作者所說，傳承自父輩的政治立場，戴卓爾夫人積極主張推動私有化，她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終導致英國向南部富有階層傾斜，北部的大批國有煤礦被關閉，工人們成了犧牲品，這條道路也成為「分裂國家的線」。作為重要歷史

見證，A1公路沿線有一座紀念二〇〇〇年火車脫軌事故遇難者的紀念碑，當時英國鐵路完成了私有化，鐵路基礎設施的維護由私營公司負責，不幸的是鐵路軌道因維護不當導致金屬疲勞，當列車經過時發生斷裂，在很多人眼中，這起導致重大傷亡的火車脫軌事故，是戴卓爾夫人的一大政治遺產。

事實上，英國文學中有關公路題材的小說，雖不如美國公路文學（如《在路上》）那樣形成聲勢，但也不乏自我探索為核心主題的佳作。最經典的當屬作家石黑一雄的《長日將盡》，主人公史蒂文斯駕車展開一趟為期六天的休假旅程，他在途中探訪一位友人時，回憶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在達林頓莊園擔任管家的往事，暴露出對舊日「美好與輝煌」的戀戀不捨。書中雖描寫了英國鄉郊的美麗景致，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卻是史蒂文斯視線裏無法離開的歷史包袱，也正是這些釀成了他的人生悲劇。

此外，作家瑞秋·喬伊斯的《一個人的朝聖》和瑞·溫懷特的《鹽之途》，都通過旅途反思人生，而約翰·克里斯多福的《末日之旅》，則充滿了社會崩潰下的公路求生敘事。至於菲利普·普爾曼的《黑暗物質》，雖是穿越平行宇宙的奇幻小說，本質上也是一場公路冒險，有着自我成長與逃亡色彩。用考恩的話說，路永遠不會結束，除非你走到盡頭。

「又見」紫藤蘿

如是我見
殷楚紅

我不覺停下了腳步，看着眼前一片柔和的淡紫色，不禁驚呼：「紫藤蘿！」我興奮得快跳起來，竟有一天我見到了瀑布般的紫藤蘿。雖是初見，對我來說卻更似久別重逢。仍記得中學課本裏的那篇《紫藤蘿瀑布》，宗璞先生筆下那片「輝煌的淡紫色」多年來令我魂牽夢繞，那虬勁盤曲的枝條上的一穗穗花串，花串上的一朵朵花苞，鮮活得像在跳躍。看似靜止的植物所傳達出的生命的力量，撫平了作者的焦慮和悲痛，也在年少的我心中埋下種子。此刻，當記憶和所見在不同的時空裏意外重合，那種子便瘋一樣地生根、發芽。

懷着某種近乎崇敬的心情，我捧起一串藤蘿，一朵朵或深或淺的紫色的花

苞，沿着嫩綠的枝條有序地排列，就連二者之間的花柄都是粉色的，兩端偏深，中間略淺。頂端的花已全部舒展開來，白中微黃，邊緣微捲；末端的花苞還沒完全開放，小口微張，漸變的紫色在最末端最深，彷彿在沉澱。

滿眼的紫藤蘿就這樣肆意地旺盛生長，哪怕只是在一個並不多人駐足觀賞的郊野農莊，盤虬交錯的枝幹早已將有些破舊的棚架遮得嚴嚴實實，層層綠葉鋪排的底色上一片片的紫色在陽光下雀躍。花如此，人亦如此。生命的旅途從開始到終結，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境，令我們掙扎、焦灼，但只要我們像這藤蘿一樣，一往無前，熱烈無畏地綻放生命的各種可能，終有一天，我們也會綠樹成蔭，花滿「天下」。

想到這裏，胸中頓覺暖流湧起，精神為之一振，前行的腳步也更加輕快了。



▲盛開的紫藤蘿。

作者供圖